

论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生存观

郑湘萍

[摘要] 从女性与自然都是生命的生产者这一理论主张出发,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者席瓦和米斯辨析了“从上面看”与“从下面看”两种生存视角的不同,强调其生存观是替代资本主义父权制经济模式的选择,并描绘了生态女性主义生存型社会的基本轮廓。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生存观主张整体主义的和谐自然观,强烈反对机械论自然观,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重新建构了自然与女性之间的关联性,纠正了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的本质主义倾向,在尊重自然界和女性的价值基础上,较好地处理了生存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在实现生存性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否定男性的贡献,契合了当前全球环境正义运动关于正义和平等的要求。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生存观清晰地展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多元生态伦理主张,为人类正确处理生存和发展关系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和借鉴的模式。

[关键词] 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生存视角;生态伦理;资本主义父权制

[作者简介] 郑湘萍,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人的生存问题历来是哲学、伦理学等学科关注的焦点之一。伦理学对人类生存问题的探究从重点关注人的社会生存意义,转变为对人的社会生存意义以及自然与人类生存相互影响的双重关注。^[1]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人类新型生存难题不断涌现,如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南北分化及发展问题、人口剧增、资源枯竭……现代生存危机不仅表现在物质生活方面,而且表现在精神文化层面,近些年来在生态环境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已严重危及人类的持续生存。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分支之一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从生存高度重新建构了自然与女性的关联,提出生存社会的美好愿景,主张实现生存性发展。

一、作为生命生产者的女性与自然

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侧重于从社会经济角度,重点研究人类统治自然与男性统治女性之

间的关联性,认为自然与女性双重统治的根源在于西方父权制式经济发展模式,主张以生存必需视角消除所有威胁和毁灭地球的社会制度及其实践,实行人与自然之间互惠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倡导人们过一种尽可能简单的生活,主要代表人物有印度V·席瓦(Vandana Shiva)、德国M·米斯(Maria Mies)等人。席瓦和米斯将在自然界许可的界限内实现“美好生活”愿景的想象称为生存观,认为人们在有限的星球中无法逃脱必然性,应该在必然领域中寻求自由而非征服或超越。^{[2](P9)}美国学者P·D·墨菲认为,生态女性主义生存观“所依赖的基本主张是女性和自然都是生命的生产者”^[3],这种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席瓦和米斯在合著《生态女性主义》(1993年)中认为,自然与女性之间的密切关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自然和妇女都是生命的生产者,这是二者最为重要的关联。席瓦从印度本土视角考察了女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历史唯物主义创新研究”(14ZDA0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方生态正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研究”(15BKS079);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项目“范达娜·席瓦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及其启示”(GD13CZX02)

性与自然的关系,强调在印度传统文化中,作为原质的自然界是一个不可侵犯的整体。席瓦强烈反对笛卡尔式、充满二分法色彩的近代西方机械论自然观,主张有机的整体自然观。她认为,女性镶嵌在自然界中,通常通过生计、食物和水的提供者等角色来持续地与生命和自然界相连。密斯把生产生计的妇女工作称为生命的生产,将其视为一种与自然界真实的生产性联系。席瓦认同密斯的观点,认为妇女和自然界的工作互为合作者,这种生长的有机进程已经创造了妇女与自然界的特殊联系。沿着密斯的思路,席瓦总结了妇女与自然之间的这种联系:“(a)她们与自然界的相互联系、与自身自然界以及外在环境的相互联系是一个互惠过程。她们把自身身体设想为有生产性的,以同样的方式把外在自然界设想如此。(b)尽管她们挪用自然界,她们的挪用不会组成一种统治联系或者财产联系。妇女不是她们自己的身体或者地球的物主,但是,她们为了成长和生长,会与自身身体和地球进行合作。(c)作为新生命的生产者,她们成为第一生计生计生产者以及第一生产性经济的发明者,这意味着社会生产的开始,以及社会联系就是社会和历史的创造”^{[4](P41-42)}。承认自然和女性是生命的生产者,必然认同以下两层认知:首先,以发展名义进行的进程是畸形的,它是女性和自然遭受暴力的来源。这种暴力既来自对良性别中立模式的误用,也根源于西方父权制的思想模式及发展战略关于同质、统治以及中心化的假定。其次,在理智危机的范式之内难以解决畸形发展模式所产生的危机,其只有在生命给予和生命维持的思想、观念以及行动的范畴内才有可能。^{[4](P45)}

另一方面,自然和女性之间的关联性还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和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存在类似性。席瓦认为,自从二分法引入社会、自然界和女性之间以来,劳动特别是男性的劳动,成为最初运用所有生活必需和便利来满足其资源,自然界不再是财富和生计的来源,妇女的工作不再是维持生计的生产性工作,而农民和部落社会也不再具有创造性和生产性。若以工业社会的框架来衡量,它们成为边缘,仅仅是作为资源和投入而已,因为工业社会的生产力仅与西方男性劳动力和经济发展相关。“贬低以及不承认自然界的工作和生产力导致生态危机,贬低以及不承认妇女的工作已在男人和

妇女之间制造男性至上主义和不平等。”^{[4](P42)}仅女性的工作被贬值,而且大多数女性还要承担更多的生态成本,生态灾难和生态退化对妇女的影响也远大于男性。

席瓦在强调女性和自然是生命生产者的同时,正确指出参与第三世界生态运动的妇女并非仅是受害者,她们在维持生命的斗争中与自然积极联系在一起,而非被动地与自然相联。大多数环境学者和女性主义者将第三世界妇女看成环境退化的特殊受害者,对此席瓦并不赞同。她认为,参与和领导生态运动的妇女(如印度妇女),并非仅仅作为受害者发言,她们在与自然界联系的过程中,积极发出解放和转变的新声音。镶嵌于自然界的第三世界妇女,与自然界一起进行生产革命,她们的头脑并未被剥夺或者被殖民,她们具有关于“什么是生命的生产和保护”的整体性生态知识,把自然界生命视为人类生产的前提条件,把自然界相互连结的完整性视为生命的重要前提。不仅在世界观上,而且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印度妇女都把自然当作一种活着的力量。她们保护的自然是活着的原质,即养育生命的生命之源。她们积极参与生态运动,既是为了自身生存而斗争,也是为了保护自然而抗争。女性只有和自然一起,才能寻求发展、相互支持以实现解放。

在席瓦和密斯看来,对生存的关注和对地球上所有生命保存的关注,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针对妇女、儿童和人类而言的,而且也是对动物群和植物群的巨大多样性而言的。由于现存世界体系必将对星球上的生命造成严重威胁,人类和自然界要持续生存,就必须复苏自然界和女性原则,这是决定性策略。

二、两种生存视角:“从上面看”与“从下面看”

密斯和德国学者W·汤姆森(Veronika Bennholdt-Thomsen)在合著《在全球化经济之外的生存观》(1999年)中,从经济视角对生态女性主义生存观进一步做了详细解释。她们追寻了生存方法的历史,探讨了全球化与生存、生存与农业、生存与市场、城市中的生存、雇佣劳动与生存、妇女的解放与生存、生存与政治等问题。在导论部分,作者以希拉里·克林顿和孟加拉Maishahati村庄妇女们在

相同问题上的不同回答为例,说明她们之间生存视角的差异性,前者采用“从上面看”的观点,而后者则运用“从下面看”的观点。

在孟加拉妇女们看来,拥有自己的奶牛、一些自己的收入、生育多个而非一个小孩,这是她们最基本的需求,这些东西靠她们自身力量来获得,她们随之获得“荣誉、尊严、自信以及生活的能力……它使得人们有能力生产和再生产她们自身的生活,能够自食其力,并且用自己的声音说话”^{[5](P3)}。这就是第三世界妇女的生存观。希拉里在其丈夫成为总统并入住到白宫后,她停止赚自己的钱,只生育了一个女儿。孟加拉妇女们为希拉里感到难过,认为希拉里没有真正被赋予权力。米斯和汤姆森认为,希拉里们和孟加拉妇女们对一种何谓“好的生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希拉里和北方有钱的姐妹们采取“从上面看”的观点,在她们眼中,一种好的生活需要很多金钱、商品以及一大堆奢侈品。然而,孟加拉妇女们不需要一个充斥进口商品的超级市场,也不会低声下气地向有钱人要钱。对于她们而言,“能保证独立的生存才是最重要的”^{[5](P3)}。像孟加拉妇女们一样,米斯和汤姆森不再接受希拉里们的财富模式,不仅因为这种财富模式不可能普及到世界上其他地方,而且因为这种“好的生活”观念破坏了自然界、外国人以及人们的自力更生和尊严甚至孩子们的未来,即破坏了那称之为入道的东西。她们知道,希拉里们“从上面看”的观点目标在于商品、服务和金钱的永恒增长,它无法逃脱自身制造的僵局。

米斯和汤姆森在孟加拉妇女们身上获得诸多启发:第一,应采取“从下面看”的观点,从妇女们尤其是南方乡村妇女和贫困城市妇女的生存观开始,关注日常生活和可持续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看清那种所谓的好生活只对少数人是可能的,了解这种生活以牺牲自然界、其他人们以及妇女和孩子的权益为代价。第二,生存观的实现主要依赖控制生存方法,即一头奶牛、一些小鸡、孩子们、土地以及一些独立金钱收入,而不是过分依靠金钱、教育、地位以及声誉。不依靠外在力量和代理人而独立生产生活所需商品的能力是必需的。第三,独立生存的意识和能力能够给孟加拉妇女们带来荣誉、尊严、勇气,以及把美国第一夫人称之为“姐姐”的平等感情。第四,一个社会主义的、无性别歧视的、生态的、

好的社会乌托邦,必须建立在每个人有生存安全的基础上,否则就是不成型的。第五,抛弃将世界区分为“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二分法。虽然孟加拉妇女们认识到这种区分的存在,但不接受这种区分及其差别评级。在她们眼中,希拉里与她们一样,有着基本的相同需求和愿望,即拥有生存保障和一些独立的收入。这种生存取向既有益于她们自身,也有益于希拉里。

在米斯和汤姆森看来,孟加拉妇女们的生存观把生产和维持生活当作这个星球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中心,并不执着于无限的金钱积聚。这与那种旨在实现工业、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以及资本集聚的持续扩张的经济模式相矛盾。它既不同于那种资本主义父权制经济模式,也不同于当前发展中国家流行的“赶超式”经济模式。前者不间断地向妇女、其他人和自然界寻求扩张。后者则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神话,它承诺所有在社会金字塔底层的被殖民人们,一定会到达高层人们的生活水平,但这只是一种欺骗。妇女们应停止贬低自身的工作、文化和力量,要解除她们身上遭受的各种压迫,即“她们自己国家里的家长制男人,跨国公司,有着结构性调整项目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服从国际资本保护命令的国家官僚机构”^{[5](P5)}。赋权只能在妇女们自身身上、在与自然界的合作中获得,而不是在对有钱人的阿谀奉承中获得。

米斯和汤姆森一再强调,她们主张的生存观是替代父权式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正确选择,是必需的、值得要的和可能的。西方资本主义父权制以暴力和统治两者为结构要素,以简化论科学知识为基础,持续殖民统治着女性与自然。作为一种不良发展,西方父权式发展在物质、生态、精神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危害。^[6]尽管目前全球化扩张的父权式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仍占据统治地位,但它并非一成不变,它本身是由数世纪以前的男性创造的,不像某些人所宣扬的那样是唯一的、永恒的。1997年以来亚洲经济危机已经证明,它并不是实现“可持续”财富的正确道路。生态女性主义生存观“不仅有益于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和阶层,如果它平等地有益于所谓的发展国家和阶层的话,它能够成为一种新的观点,二元论的、等级制区分和秩序的经济将不再会被接受”^{[5](P4)}。这种生态的、经济的、女性主义的、反全球化的生存观是必需的,而且这种新导向已经在

世界上不同地方以多元化方式开始实践。它将在女人和男人之间、在代际之间、在乡村和城市地方、在不同阶层之间、在不同人群之间,尤其是在人类和自然之间,产生不同于以前社会联系的变化。总之,生态女性主义生存观是一种视角,一种观点的转换。

三、生态女性主义生存型社会的主要特征

席瓦和米斯从生存必需视角描绘了善待自然、妇女、小孩和男人的生存社会的美景。她们从生活基本需求开始,以那些为直接的生存而奋斗的印度乡村妇女为例,主张地球母亲和第三世界妇女一起生存下去,这样才能二者都获得真正的自由,实现彻底解放。作为一个潜在的具体乌托邦,生态女性主义生存型社会具有九方面的特征。

第一,经济活动目标为生活的创新和再创新,而非为了匿名市场而不断生产商品和货币(薪水或者利润)。社会经济主要通过使用价值的生产,而非商品的购买来满足基本的人类需求。区域性以及国家官僚机构的非集权化是主要的经济政策。人们使用局部和地域性资源,但不是被他人掠夺。市场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

第二,经济活动建立在全新的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上。人类敬重自然,不仅因为自然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而且因为自然是地球上所有生物存活的前提条件。“自然不会因利润的原因而受到剥削……资本主义对自然界的破坏将会治愈。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建立在尊重、合作和相互性的基础上。”^{[2](P319)} 不仅人与自然的剥削性关系得到彻底改变,而且人类间的统治关系也彻底改变。相互性、相关性、团结、可靠性、分享和关心、尊重个体以及为了整体的责任等,成为人类尤其是女人和男人之间联系的主要内容。“生存观只能在一个可靠的、稳定的人类联系网络中实现,它不能建立在市场经济自动化的、自私自利的个体基础之上。”^{[2](P319)}

第三,生存观建立在参与式或草根民主的基础上。废止政治和经济间的区分,以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议会、日常生活以及生活方式都是政治战场。

第四,生存观运用多维度或合作的方法来解决

问题。“社会问题(父权制联系、不平等、异化、贫困)必须与生态问题一起解决。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相互连结以及问题和解决方案的连结是生态女性主义主要见解之一。”^{[2](P320)}

第五,生存观点使用以强调社会正义价值导向的科学技术和知识新范式。彻底摒弃当前流行的工具主义以及简化论科学和技术,因其以二分法为基础并维护男人对自然、妇女以及其他人的统治。将在人们的参与式行为中实施生态声音、女性主义的生存科学和技术。草根的、妇女以及以人为本的知识和科学,因古老的生存智慧传统得以延续而受到尊重。

第六,生存观重新整合文化和工作以及精神和物质。工作集责任和快乐于一身,以实现幸福以及十分愉快的生活为目标。渗透于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则比那些专为文化精英所独有的、苦闷的活动更为宽泛。生存观同时抵制机械物质主义和幻想的精神。

第七,生存观抗拒私有化,抗拒把公有资源如水、空气、垃圾、土地等商品化。相反,生存观需要自然界保存下去并实现再生,人类应当养护自然界的责任。

第八,在强调妇女首创精神的同时,不把男人排斥在创新和继续生命的责任网之外。“一种生存观必然意味着,男人实际上开始分担创新和保存地球生命的责任。因此,男人必须开始重新定义其身份的运动。他们必须放弃参与那种破坏性的商品生产,分担妇女的生命保存工作。在实践上,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分担那些没有报酬的生存性工作:如家务劳动、带小孩、照顾老人和病人、参与治愈地球的生态性工作,用生存生产的新形式。”^{[2](P321)}

第九,生态女性主义生存观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有利于建设非军国主义的和平社会。因为,随着生命生产和商品生产活动之间二分法的废除,以及男人和妇女一起参与生存生产,男人既不会有时间也不会有爱好来追求破坏性战争游戏。“只有一种建立在生存视角基础上的社会,才能够与自然界和平相处,才能维护民族、后代以及男人和妇女之间的和平,因为它没有把一种好的生活的观念建立在剥削和统治自然界和其他人基础之上。”^{[2](P322)}

总之,在席瓦和米斯建构的美好生存社会里,自然得到人类的尊重和养护,经济模式建立在自我

实现、相互性和自我供应的基础上,女人和男人、老人和年轻人、所有的种族和文化都能够分享“好的生活”,社会正义、平等、人类尊严、生活的美丽和乐趣都得到真正实现。席瓦和米斯对此保持乐观,她们相信,美好的生存社会愿景并不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幻想。

四、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生存观评析

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者席瓦和米斯等人的生存观具有强烈的生态伦理意蕴,在当前发达国家加快掠夺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原材料和土地等资源步伐以及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展现出强大的阐释力和现实意义。

第一,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主张整体主义的和谐自然观,强烈反对机械论自然观,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自然不仅仅只是为人类利益服务的工具,而是与人类共存共荣的伙伴。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提出一种整体性的、拥抱所有生命的新宇宙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和谐自然观,替代等级二元论的父权制世界观和机械型自然观。它尊重和维持所有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强调通过相互合作、相互关心和爱的方式来维持自然界生命和人类生命。

第二,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重新建构自然与女性之间的关联性,进一步纠正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的本质主义倾向。在加强或是解构还是重新建构女性与自然之间紧密关联的问题上,生态女性主义者存在诸多分歧。主张加强女性与自然亲密性的生态女性主义者,被认为会掉入本质主义陷阱。席瓦和米斯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本质主义进行了重构,在看到女性、儿童以及其他弱势群体乃全球性生态危机受害者的同时,强调第三世界乡村妇女与自然的连结是创造性的,而非被动性的,是对生命的延续。尽管她们关于女性原则的复兴才是生态危机的唯一解决之道的提法尚有争议,但从第三世界妇女视角看到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妇女立场的不同,发现并强调了第三世界妇女与自然关系的积极性。

第三,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的生存观在尊重自然界和女性价值的基础上,较好地处理生存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作为保证人类健康生活最低基础的公共资源,自然被视为人与之持续生存的伙伴,其

必然性重新被发现,并得到人类尊重,自然界的再生产被再次强调为生命生产的关键前提,女性的价值也重新得到尊重和重视。生态女性主义举例证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社会,在物理、逻辑、道义等方面都是不可能的。她们强烈谴责“囤积和发展的逻辑是一种父权和男权中心逻辑”^[7],认为相互共生、相互依存的自然界生命和人类生命的伙伴式再生性方式,不会危害其他生命,也不会对可持续性生存造成威胁。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从自然界以及人的生命存在出发,将存活下去的生存视为生命的底线,将可持续发展视为更高层次的生存欲求,追求把人看成是自成目的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发展。这是一种多样性发展,而非独断式、高扬理性主义哲学旗帜的发展。

有些学者批评席瓦和米斯立场过于激进,比如反对发展,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她们批判和抵制的是西方父权式畸形发展,担心不发达国家遭遇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负面影响。在主张寻求适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适度发展的同时,她们强调避免采用使人类和生态关系进一步恶化的生活方式,并非要人类返回打猎采集或耕种的原始生活方式,而是要适应时代要求,选择不是有害的、符合自身的满足人类需求的生活方式。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的生存观没有割裂生存与发展的密切关联,而是主张实现生存性发展。在保证自然界生态平衡和地球上所有人的基本生存的基础上,寻求进一步的可持续性发展。这种生存性发展把人的基本生存欲求和高层次的多样性发展欲求较好地结合起来,把人类生存视为自成目的性,重视提高生存质量,这有利于我们重新理解人的生存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建构人类新的生存可能性。

第四,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的生存观没有否定男性的贡献。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认为,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父权制,克服错误的二元论和二分法,建构新的生存性美好社会,都需要男性的加入、改变和积极作为。她们把所有生命的相互依赖置于一种新伦理和政治的中心位置,不会把男人排除在创新和继续生命的责任网之外。重新定义身份的男人和妇女,一起分担保存生命的工作。这是一种现实而明智的策略。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者明白,妇女优越于男人、自然优越于文化的做法仍然是一种二分法,保留着敌对性联系,存在于两个被分开

的、等级制秩序的部分之间。女性的男性化并非是女性实现解放的明智之举。

第五,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的生存观契合全球环境正义运动关于正义和平等的要求。生态女性主义特别关注女性的生存和现状,席瓦更是从第三世界乡村妇女的视角,深入考察了印度女性受本国男性和发达国家男性剥削的艰苦生存现状。她亲身参与20世纪70年代以印度乡村妇女为主体的“抱树运动”,认为她们表现出捍卫自然界和自身生存权力的非凡勇气和坚定决心。印度环境历史学家R·古哈(Ramachandra Guha)则认为,印度妇女在印度环境运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现代印度环境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她们不断上街游行,以反对滥砍滥伐森林、非法采矿、开垦以及过度捕捞等。印度妇女在绿化荒山、保护水源以及推广节能科技等环境重建项目中发挥着领导作用。^{[8](P58)}印度妇女充分认识到自身与自然共生存的事实,并以实际行动反抗环境非正义以及性别不平等。在生存受到严峻挑战的事实刺激下,在寻求正义和平等价值目标冲动的驱使下,印度女性立足本土的同时又面向全球,以首创精神开创生存替代模式的思考。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生存观清晰地展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多元生态伦理主张。后者强调作为生态存在的人类应尊重自然,重视并致力于保护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倡导多元的生态文化,反对全盘西化以及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主导的单一基因文化,积极提倡关爱、关怀和公正的伦理价值,主张以相互依赖模式取代以往的等级制关系模式,反对各种形式的歧视,并将环保运动与社会正义、人民生计相联系,等等。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

的生存观或许有些浪漫色彩,其小规模生态型农庄模式以及反全球化导向不完全切合当前实际,但她们主张变革当前高生产的生产方式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尽管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的新型生存方式并非能够真正实现,但其融合环境的努力仍值得肯定。

[参考文献]

[1]王国聘.生存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2).

[2]Vandana Shiva & Maria Mies Ecofeminism, London Zed Books,1993.

[3][美]帕特里克·D·墨菲著,华媛媛译.环境正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生存观在当代文学中的应用[J].山东社会科学,2014(1).

[4]Vandana Shiva. Staying alive Women Ecology and Survival in India, London Zed Books,1988.

[5]Maria Mies and Veronika Bennholdt-Thomsen. The Subsistence Perspective Beyond the Globalised Economy. London Zed Books,1999.

[6]郑湘萍.范达娜·席瓦的资本主义父权制批判理论研究[J].伦理学研究,2013(6).

[7]Juan Tortosa.“What is Ecofeminism” Interview with Yayo Herrero, in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Online Magazine December 2011, p3.7/19/2012. <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2407>.

[8]Ramachandra Guha. How Much Should a Person Consume? Environmentalism in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